



风雨中的

Fengyuzhong de Yebaihe

野百合

中国现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文学武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文艺学博士点经费资助出版

风雨中的野百合

中国现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中的野百合:中国现代文人的悲剧命运/文学武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 - 7 - 216 - 06735 - 5

I. 风…

II. 文…

III. 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845 号

风雨中的野百合

中国现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文学武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60 千字

插页:3

版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735 - 5

定价:3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MULU



火与冰

——对鲁迅命运的思考 /001

阳光中的向日葵

——对胡风命运的思考 /023

风雨中的野百合

——对王实味命运的思考 /043

枉抛心力作英雄

——对瞿秋白命运的思考 /059

飞扬与落寞

——对郭沫若命运的思考 /077

多情却被无情恼

——对老舍命运的思考 /099

林花谢了春红

——对丁玲命运的思考 /116

昨夜雨疏风骤

——对曹禺命运的思考 /135

把栏杆拍遍

——对沈从文命运的思考 /152

梦里不知身是客

——对周作人命运的思考 /172

逝去的风景

——对林徽因命运的思考 /186

一朵遗世独立的花

——对张爱玲命运的思考 /201

生怕情多累美人

——对郁达夫命运的思考 /216

花落知多少

——对何其芳命运的思考 /233

风中芦苇

——对艾青命运的思考 /256

后记 /276



——对鲁迅命运的思考



2006年5月,我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搞了一次“鲁迅新文化周”的活动,来自全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鲁迅的亲属和同学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说来奇怪,原本以为这所以理工科擅长的学校没有多少鲁迅的知音,不想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同学们提的问题也很尖锐、专业。当然,更引起我思考的是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先生的一番感慨。他的大意是说,多年来,作为鲁迅的家属,他们非常可悲地发现鲁迅正在远离他们而去,成为一尊冷冰冰的政治雕像和意识形态的玩偶,他们和鲁迅除了可怜的仅有的一点血缘关系外,已没有任何更多的关联。换言之,鲁迅的形象已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不再是有着和常人一样情感的丰满血肉之躯。语气的悲凉、凝重让人为之动容。确实,在现代中国,任何人的文化地位都无法和鲁迅匹敌,他被尊奉为和孔子一样的圣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每年都有关于鲁迅的学术研讨会,每年都源源不断地涌现着研究他的文章,可是我们发现,鲁迅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疑问不仅没有消失还在增加。鲁迅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

对他有着怎样的误读？他和我们的今天有怎样的关系？鲁迅能否会像他希望的那样被人们忘掉而不再成为民族巨大的包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接触、研究鲁迅十几年后，又一次进入到他的用冰冷外衣包裹着的世界。

鲁迅的一生用悲凉、寂寞或苦痛这样的沉重字眼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虽然在人们的回忆中或照片上我也曾感觉过先生那难得的笑容，但我感受最深刻的还是他那道紧锁的眉头以及深邃、警觉的目光和苍老的面容。甚至有时我都能推断鲁迅那疲惫的精神状态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为什么会如此呢？读鲁迅的作品有时也有片刻的轻松，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有着说不出的压抑，以至喘不过气来。因此不少时候我就尽量想不读他的作品，免得打破了自己生活的常规，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身边的亲人，可我发现这些努力都是枉然，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走出的生命轮回吧。鲁迅的这种寂寞感和创伤也许在少年时代就孕育着的。他的父亲脾气暴躁，特别在科场案发后，情绪低落到极点，鲁迅全家为他父亲的病而深深困扰，尤其是父亲的死对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折磨不仅是大量的经济上的消耗，更是对亲人精神上的重压，鲁迅常年在当铺和药铺中间穿梭，对父亲，他尽了自己的孝道。在父亲死的时候，他目睹了发生的一切：“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鲁迅：《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第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版本同，不再逐一注明。）面对自己声嘶力竭的呼喊，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父亲的死亡对鲁迅一生都是灰暗的回忆，他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体会了死亡，人类在死亡面前的脆弱、惊悸、绝望也深刻留在他的记忆中。我相信这对他日后的写作活动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鲁迅这种情绪发生致命影响的还有他的不幸的婚姻。多年来，很多青年学子不知道朱安是谁，他们只知道鲁迅的妻子是许广平，那种故意的回避历史、为圣人避讳的心理和做法掩盖了多少真相，这也直接导致了部分学生疏远了鲁迅。他们以为鲁迅就是一个冷血的战士形象，他似乎没有

个人感情，没有喜怒哀乐，只是用那一支被喻为匕首的笔高高在上地批驳着这个世界的一切。长期以来，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就这样被遮蔽了，活在许广平高大的身影背后。

从研究的角度看，鲁迅的早期婚姻生活非但不应回避，而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才对。学者林辰先生说得好：“研究一个伟大人物，有些人往往只从他的学问、道德、事业等大处上着眼，而轻轻放过了他的较为隐晦、较为细微的许多地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大文章，有时会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的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目、真精神。”（林辰：《鲁迅的婚姻生活》，见林辰《鲁迅传》第2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据一些人的回忆，朱安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突出，眼睛有些下陷，带有病容，尤其是那双小脚缠得小，也没有任何受教育的背景。可见，朱安无论是在相貌还是文化气质上都是一个极普通的女子，鲁迅对她的不满也就可以想见了。鲁迅和他那一辈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但他的心灵世界对朱安是始终关闭的，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和语言的交流。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生活了近20年，这种近乎冰火不容的夫妻关系对鲁迅、对朱安都是一种摧残。鲁迅后来曾说：“爱情，是我不知道的。”“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要好好保存。”朱安也曾努力地想弥补两人之间的隔阂，但她的每一次努力不仅没有得到鲁迅的赞赏却使他更加反感，她叹息自己的命运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女士》，见孙郁、黄乔生主编《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25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朱安这些话的辛酸、无奈让人为之叹息，这也恰是她的悲剧。作为一个旧式女子，她永远无法理解精神上的契合和沟通在夫妻关系上的重大作用，以为嫁给了鲁迅就拴住了他。我们同情朱安的不幸，更同情鲁迅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精神的虐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下指责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却成了一些年轻学人否定鲁迅的突破口和时髦的行为，我清楚地记得上海某高校青年忿忿地说，鲁迅的一生一直都在压迫着朱安。观

点虽说尖锐,可惜却找错了靶子,不去指责当时的礼教制度却去指责某个具体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未必明智吧。

接下去我们就好理解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夕甚至延续到 20 年代中期鲁迅那一段凄清的生活了。既然婚姻如此不幸,再加上思想上的矛盾,鲁迅几乎是用自虐的方式来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的生活异常简单:常年穿一身蓝布或灰布长衫,冬天穿的衣服也很单薄,为了抵御北京的严寒,他经常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人说鲁迅穿得很单薄是为了压抑自己的性欲,恐怕也有几分道理。在我的记忆中,鲁迅一直主张健全、合理、符合人性的家庭生活,他的《寡妇主义》、《我之节烈观》不都表达过这种思想吗?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64 页。)鲁迅学的是医学,他从生理的角度来推测一个人的性格、心理是很有科学依据的。有人说鲁迅性格多疑、敏感,想来也很自然。当时他三十多岁,正是人生的壮年,却时常患有感冒、牙疼、胃痛、神经衰弱等病症。“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17—41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这种彻骨的孤独、寂寞对一个人的生命未尝不是巨大的损伤,但在艺术上却成为难以企及的顶峰,这种体验不可能贯穿人的一生。当鲁迅和许广平结合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后,他的创作和心态便成为另一番样子。在艺术的纯粹性上,我一直把先生这段时期写作的《呐喊》、《彷徨》、《坟》、《野草》、《朝花夕拾》等看作最完美的艺术,也格外地推崇。我们来看他《野草》中的描写:“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但是,有几枝还低梗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秋夜》)“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影的告

别》)“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我的心分外寂寞……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希望》)“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过客》)。《野草》、《彷徨》中的强烈的苦痛和寂寞是那么明显地存在,可我们的研究者长时期却忽视了这点,以为强调了鲁迅低沉、阴暗的心绪就影响到他的光辉和圣洁。直到前不久我的一部书稿中关于鲁迅这方面的论述,依然让有关的编审不安,在他们的心目中,鲁迅可始终是一位不知疲倦、永远战斗的战士形象啊。

我要说的是,鲁迅的这种情绪始终没有消失过,到了他的晚年,甚至有所抬头。读他晚期的作品,分明有着焦灼、烦躁、凄凉。这里面有思想、人际上的纠葛、矛盾,鲁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也未尝不深深失望。到处是屠杀、专制、恐怖,左联的某些领导人盛气凌人,对他缺乏起码的尊重等,这些都对他的情绪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问题的复杂性还不在于此。陈丹青先生的演讲给了我很好的启发,他从死亡的哲学命题逼近了鲁迅的生命形式。假如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认为对鲁迅晚年情绪潜在的、巨大的制约恰是疾病和死亡的阴影。

鲁迅很早就体弱多病,少年时代曾目睹过他妹妹、弟弟、父亲这些直系亲属的死。妹妹出生后不久就夭折,病危时鲁迅在屋角暗暗哭泣,母亲问他原因,他说:妹妹病得利害啦!他的早期的一部杂文集名为《坟》,恐怕也是经过了一番认真思考的,有一段时间我也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个怪异、寒气的名字。他在厦门寂静的夜晚写着:“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83页。)20年代中期,他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为此大病一场,持续多日。30年代中期,鲁迅的身体明显衰老。他在去世前的一个来月写了一篇文章《死》,而这几乎就可以看作他向人世的最后告别遗言:“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些了影响,日夜躺着,

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鲁迅全集》第6卷,第611页。)这就是人在疾病折磨中的真实心境。鲁迅明知那种诸如抽烟、喝浓茶、拒绝休息和疗养、日夜玩命地工作的生活方式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可怕的影响,他却依旧这样做,加速着自己的死亡进程。除了疾病之外,此时鲁迅的友人、学生接二连三地去世也让他愤怒、悲哀、惊愕,他一直生活在这种浓重的死亡氛围中。去世的人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文艺理论家瞿秋白;鲁迅欣赏的年轻画家陶元庆;左联作家柔石、殷夫等五烈士;未名社作家韦素园;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友刘半农;鲁迅的同乡、著名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这些人中有些是被暴政的统治者杀害,有的是病故。鲁迅深为他们的死痛惜不已,并为他们写了不少追悼性的文字,如《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等。这些直面死亡的文字可算作鲁迅作品的极品。写韦素园:“自素园病歿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期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纪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67页。)”“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86页。)对于死亡这样最悲哀的事情,却要用世间最朴实无华的文字冷静、客观地描述,这对于鲁迅会是怎样的折磨?

好了,鲁迅的确太寂寞、太苦痛、太需要休息了,1936年10月19日在剧烈的喘息之后,先生终于离开人世,去拥抱他渴望的世界:“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59页。)

二

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角色遭到了质疑和消解。许多人一上来写文章就宣称他只承认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或作家或小说家或文体家什么的。也许他们认为思想家这个头衔曾被滥用,尤其是在鲁迅身上。否定了鲁迅思想家的角色就可消除权威术语对他的束缚,而鲁迅也才可以真正解放出来。还有一种观点对思想家的要求非常苛刻,这也并无什么不妥,假如思想家满街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学术大师满天飞,岂不比没有思想家更可悲?我却固执地认为,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思想家,他是20世纪中国真正用自己的头颅来思考的作家。鲁迅没有了思想家的定语和属性,他和众多的作家还有什么区别?他从来不迷信权威,也从不相信“导师”,他最早喊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这种质疑的话语。他用随感等文学方式建构着巍峨的思想殿堂,其思想的尖锐、深邃、复杂和系统性在20世纪中国并无第二人。也许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真正学会独立思考,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和知识分子最应珍视的品格。

很多年前,有一个初出茅庐的研究者李长之出版过一部《鲁迅批判》的著作,当时他还是20来岁的学生。由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欠缺和对鲁迅了解不深,他否定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角色,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假如鲁迅不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么谁会成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呢?我苦思冥想也还找不到第二人。鲁迅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一切要素:敏感、多疑、独立思考,对一切当权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不合作的态势,他是用东方人特有的感性方式进入到人类最澄澈的思维顶峰。

在漫长的封建体制下,由于当权者的高压和欺骗,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统治者所驯服的工具,也就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即使如魏源、龚自珍等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也还有明显的补天思想。但鲁迅不是这样,他的思想建立在深刻的否定和批判的基础

上,一切既定的秩序和准则都遭到了他强烈的质疑。看吧,在《野草》中,这样的句子到处都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野草·淡淡的血痕中》)“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野草·影的告别》)鲁迅这种异常清醒的怀疑、批判意识来自他长期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鲁迅生于现代中国最动荡、最忧患的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现实的严酷性使鲁迅终生对所谓的理想世界保持着距离和警觉。在封建专制的年代,他透过所谓的“陈年流水簿子上的仁义道德”,看到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二字;在启蒙者的年代,他通过夏瑜的鲜血染红了华小栓的馒头深沉地指出了先驱者被愚昧者所吃的历史悲剧;在五四时代,当无数的青年激动、忘情地喊出“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等口号的时候,他通过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无情戳穿了这些口号的空洞无力;在大家都向往革命的时候,他却在《呐喊》中的一篇小说中质问那些空想者:“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也许由于鲁迅在革命、革命文学问题上的低调,他在20年代初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年轻、激进、以革命者自居的作家的围攻。在我的印象中,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钱杏邨等都抨击过鲁迅,指责他顽固、保守、堕落,郭沫若化名杜荃骂他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其语言的恶毒、文风的粗暴让人惊诧。在那个年代,革命和革命文学可是个时髦的词,许多青年以为革命一成功,便像阿Q那样要什么是什么。而鲁迅却接连向他们发出警告。在《革命文学》的杂文中,他通过苏俄时期的一些作家从向往革命到对革命绝望的事实说:“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鲁迅全集》第3卷第544页。)鲁迅的话不啻是对那些单纯、狂热青年的棒喝,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鲁迅的远见卓识。一些共产党早期的代表人物和革命文学的代表人物,有

的人不久不就助纣为虐、屈膝事敌了吗？

在关于革命、革命文学的问题上，鲁迅的思考是最成熟、最富有前瞻性的，你可以不佩服鲁迅的为人之道，甚至你也可以不佩服他的文字、他的秉性，但你无法不佩服他的深邃和睿智。比如，关于农民革命，鲁迅一方面同情他们，却又始终注意他们身上盲动、破坏性的一面，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尤其是张献忠几乎没有什么正面肯定的文字。他在《阿Q正传》中对阿Q式的革命是有所批判的。阿Q式的革命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呢？小说是这样描写的：第一，是政治上的复仇，“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显然阿Q的复仇是一种本能的报复，他把小D、王胡与赵太爷竟然并列，明显是搞错了对象。第二，可谓经济革命，“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最滑稽也最值得深思的是阿Q关于女人的革命。未庄的女人如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以至吴妈等众多女人在他眼前闪过，使自己花了眼。可见，阿Q式的革命如果没有启蒙者的正确领导便会蜕变，就像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一样，也许他会在未庄建立一个新的、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多年后，在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中，阿Q的这种革命在土改农民王秋赦身上得到了一一验证。王秋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自己掠取了大量的实惠以至权利，对别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社会生活归于平淡、正常的时候，他却发了疯，声音凄凉地喊道：“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这种幽灵般的声音不仅飘荡在20多年前的芙蓉镇，也应当飘在今天那些健忘者的心头。看吧，这就是阿Q革命的复活。

毛泽东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语道破了革命的残酷、诡秘。而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曾说过：“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鲁迅全集》第10卷第336页。）鲁迅反对一切廉价的、空

头的许诺,直到临死前写的《死》中还这样告诫家人。他非常明白中国社会的复杂、保守势力的强大、传统心理的顽固等等,这些无疑增加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变数。因此他不止一次地要求人们对革命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否则就会撞死在玫瑰花的刺丛中。他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想当初,有几个人能揣测这迷宫式的语言中所蕴涵的真义?只有当我们把目光放置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场景中,我们才会明白他预言的价值和悲剧色彩;只有我们看到了王实味、胡风、丁玲、冯雪峰、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后,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分量和沉重。鲁迅不是能准确预测未来的先知和圣人,但他却以超常的智慧和独立思考的精髓指出了政治、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冲突、矛盾,两者并非天然的和谐,相反它们在革命成功后会加剧这种冲突。他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中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安定。”(《鲁迅全集》第7卷第113—116页。)可以说,能读懂此句者,即明白了中国历史的大半。

按照今天的话说,鲁迅是一个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职业者。在晚清时代,他是一个叛逆者,在日本和反清组织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关系密切,对于徐锡麟、秋瑾这些烈士是钦佩的,尽管他并不赞成他们蛮干的做法。在民国初年,他对革命也是有怀疑的,对那些如王金发之流的革命者时有批评。在北洋政府时代,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敢于挑战顶头上司章士钊的权威;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他同样对其暴政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和斗争。面对在广州目睹的“清党”惨象,他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愤而辞职。同样,在左联时期,他对周扬、徐懋庸等的以钦差大臣自居的做法也进行了抵制。鲁迅从来不和当权者合作,萧军在延安时期就说,鲁迅从来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鲁迅有许多机会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却自愿辞去大学教职甚至教务长的职务,成为靠稿

酬来生存的“公共知识分子”。鲁迅职业的写作生涯和独立的知识分子角色使他每每能用旁观者的冷静去思考、去批判,他是一位绝对独立的精神界战士,金钱、权利、暴力、软暴力等一切在大多数人身上发生作用的因素在他身上统统失去了效力。甚至在面临无物之阵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他依然举起了投枪。想一想,有几个当权者喜欢这样的鲁迅呢?即便从职业选择的道路上,他的这种勇气也是非凡的。

近些年来,鲁迅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尤其是和胡适的关系成了学术上的热点,甚至有人不无煽情地用“鲁迅还是胡适”这样醒目的名字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承认,胡适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一个学术巨人,以前我们漠视、否定他的成就当然不妥。但有的人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行两人比较之名,实质上却是赞赏、倡导胡适的宽容、自由等精神,以此证明、否定鲁迅个性主义的所谓偏激、激进。其实在中国最了解胡适的仍是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等成立“新月社”、创办《新月》杂志,进而对国民党专制大加讨伐、赢得一片喝彩的时候,鲁迅通过《红楼梦》中焦大骂贾府的现象一针见血指出了其小骂大帮忙的实质。在我看来,撇开学术、文化上的贡献不谈,胡适在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的能力上远逊于鲁迅。他在骨子里没有一天真正独立过,他永远在寻找自己的主子,一日无君便惶惶然。他始终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也一直存在幻想,甚至在年迈之时拖着病体跑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还不是对蒋氏政权抱有幻想?结果怎样呢?《自由中国》被查禁,学生雷震被捕入狱,他还不是哑巴吃黄连,和贾府中的焦大被灌马粪有什么区别?

话题又转到了当今的知识分子。今天大家都承认,在学术的宽容性上我们获得了比前人更大、更多的自由,但有的人把这种权力滥用到了鲁迅身上。他们放肆地发泄着对鲁迅的不满,什么鲁迅极端了,缺乏民主思想了,脾气怪了,睚眦必报了,阴毒了等等。但作为体制包裹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拿着单位提供的不薄的薪水,面对那些诱人的诸如名誉、职称、课题、金钱等施舍,有谁像鲁迅那样发出过这样的咒骂吗:“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秃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

见；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应该得到诅咒。”（《野草·过客》）有谁有过这样独立的人格吗：“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野草·求乞者》）有谁有过这样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意识吗：“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54页。）以自身苍白无力的人格去非议一个时时在恐怖的环境中生存、处于弱者地位却还有独立思考的人，既不合情理，也没有公正可言。

三

鲁迅对我构成强烈震撼的，还有他的“立人”思想，这是他对现代中国观察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是所有问题答案的归宿。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中国普通的民众争取做人的权利，使他们享有正常人的尊严、自由和幸福，他不是那种以俯视的姿态来观察民众的人，而是熔铸了自己的血泪和感情。可以说，在现代中国还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持久关注“人”的作家和思想者。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自觉地担负起这副沉重的担子。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痛苦地追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由于痛感历代统治者采取瞒和骗的手段而导致民众的愚昧无知，他在《文化偏至论》的长篇论文中对自己的“立人”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把启迪民众摆脱愚昧、精神自觉、自省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搆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全集》第1卷第56、57页。）他很早就意识到物欲横流时代对人的精神重压，把人的精神启蒙列入最先考虑的日程。出于对民众的失望，他更渴望成为精神界的超人。这样，他的世界就和尼采产生了强烈共鸣。

尼采，这位重要的德国思想家，长期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名声，有